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一

(86)漫谈国际政治



第一章 亚洲

日本发展的制约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演变，多极化战略格局的轮廓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变动中的国际形势既为日本提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压力和制约。从近年来日本为调整对外战略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战略实施的策略和手段表现出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趋向。这种新趋向概括说来就是：在力争维护和巩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注重将经济、科技、金融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积极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继续保持与美国的结盟关系，但对外战略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更注重外交的“独立性”，并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注重增强在亚洲的存在，企图构筑一个牢固的战略依托。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日本的外交战略也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自身的弱点和并不乐观的外部环境影响着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效果，并将制约日本在国际间的作用。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日本外交日趋活跃的一面，而忽视日本受到局限甚至是严重局限的另一面，就不能准确判断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长远趋势。日本受到的制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其侵略历史，严重伤害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从而必然会影响到日本在国际上政治作用的发挥。日本在二战期间参加法西斯集团，发动了侵略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的战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战争中，日本给被侵略国造成了空前的伤害，亚洲国家至今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记忆犹新，担心日本重新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就是西方国家也对日本余悸未消。然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朝野上下都有人竭力宣扬所谓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即新大和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做理论上的准备，日本要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同时又在快速发展军事力量，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事实说明，日本过于专注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这就难怪亚洲许多国家对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从历史教训看，人们有理由担心日本在亚洲的作用过分增强，这无疑将影响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认为，日本的军事实力提高得越快，在政治上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

第二，日本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在国际体系中定位，因而日本对外战略的选择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冷战时期，受全球两极尖锐对峙的战略格局的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安全利益在各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各国均将安全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而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居于次要地位。日本虽然也是如此，但却有明显的特殊性。日本作为战败国，二战给他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实力被严重地削弱了。日本借助美国的核保护伞和军事保护，主要依靠“外力”就使得安全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得以比较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经济实力迅速提高。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日本才逐渐有可能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经贸关系上向美国显示强硬姿态。当时，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尤其是政治利益关系是比较简单的。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基本是同盟关系，可以说政治安全利益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政治安全领域

利益的一致还延伸到经济领域，虽然在冷战结束前，日本与美国、西欧存在一些经济磨擦，但并不突出，在此期间，日本与苏联和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冲突占主要地位，这也影响到相互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即使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苏联剧变，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日本在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定位还未确定。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共同敌人”，日本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松懈，一些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由于日本的跨国资本表现出较强的扩张实力，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冲突上升，冷战时被一定程度掩盖的文化差异也发挥了作用。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日本与欧洲进行合作已经越来越重要，但贸易不平衡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俄罗斯虽然不同于过去的苏联，但与日本之间还遗留一个北方领土问题，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解决的难度也将增大。日本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都极为重要。但是在一些日本人中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仍然存在，认为“中国对日本来说至少是在未来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又认为“如果美国准备对付”（中国的威胁），“日美安全体制的说服力就进一步增强”。美日重新确认和加强两国安全同盟，反映出面对迅速发展多极化局势，这两国在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和协调仍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两国关系的主要方面，但从长远看，美日两国在国家战略方面上存在着矛盾。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最终要同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发生冲突，日本要实现独立的外交就不可能长期追随美国，而一旦日本摆脱美国的束缚，美日矛盾必然上升，从而将影响到美日同盟的命运。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日本的“独立性”外交是否会做到真正独立。这里不仅是外交独立性问题。日本力图在不脱离西方的前提下，逐渐把对外战略的重心转向亚洲地区，但问题是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不注重亚洲，就没有战略依托，而要向亚洲倾斜，除了历史因素的局限外，日本还有其他苦衷。在许多领域日本有求于西方，它在北美和欧洲拥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就解释了日本为何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日趋发展的情况下，却对在亚洲地区建立排他性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不积极。实际上，日本把亚太地区看作决定它政治经济发展前景的关键性地区的同时，从来不敢怠慢同美国的关系，近来又反复强调巩固和发展同欧洲的关系，在政治上，为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不会仅仅限于在亚洲地区的联合。经过二战结束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也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和对外援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使得日本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日本要想成为政治大国进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各大国的支持。而概括起来，由于日本“东西方不分”的模糊地位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因素，也由于日本的利益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内在矛盾性，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中矛盾与协调的两重性比较突出，并将使其对外战略中原来就存在的比较强的不定性更加突出。

第三，日本经济实力虽然强大，但又存在一些明显的、无法摆脱的脆弱性；从长远来看，国际经济固有的运行规律对它的制约尤其不可忽视，并最终将影响到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尽管日本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但日本经济本身具有脆弱性，决定了它对外部存在很大的依赖性，日本历届政府都依靠对外政策力求弥补经济的脆弱性，但终究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以上三方面将制约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进行“独立性外交”所难以摆脱的制约。

新时期朝鲜半岛新秩序

在冷战期间，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对抗的一个重要战场，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越级大国争夺的对象，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划出了两个社会性质相异的两个国家，成为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界线，而在冷战后，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西德统一，更加引起了人们对朝鲜半岛的注意，一时间，朝鲜半岛二个国家合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朝鲜和南朝鲜合并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朝鲜半岛的未来发展还不确定。

冷战结束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相继调整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他们的共同点是三国都希望保持半岛稳定，实现无核化，防止战争，促进南北对话，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实质上三国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又有不同的目标和打算。

首先，我们来说说美国，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失去了苏联这一强有力的对手，美国更想独霸朝鲜半岛，企图主导朝鲜半岛新秩序。

冷战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的特点最初是“战略收缩”，但是现时期已转为“主导新秩序”。美国在布什总统时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强调：鼓励南北对话，建立信赖，缓和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减少驻韩国（南朝鲜）的美军，并逐步将美国在韩国国防中的“主导作用”转为“支援作用”。但在克林顿上台后，这些内容都被修改了，在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中有所体现：强调要保持在韩国的驻军，继续增强韩国军队的防御能力，适当地让韩国分担防御费用，普及民主主义，“保护人权”。由此可见，冷战以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中心已经由一开始的优先注重经济利益，而扩展为同时注重经济、外交和安全利益，并且显示出了美国不但无意退出朝鲜半岛，还要全面参与半岛事务，主导构筑新秩序。

美国为了进一步确立“主导地位”，选择了相应的“弹性”措施。对朝鲜采取“软着陆”政策，美国认为，朝鲜是一个“越打越硬”的国家，和朝鲜打交道不能采取对待伊拉克的硬打的方式，应该通过接触和对话使他“软着陆”逐步被国际社会接纳，为此。美国现总统克林顿在对朝鲜的政策上，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比如我们所知道的1994年美国以和平方式同朝鲜签订了核框架协议，1995年在纽约正式签署轻水堆供货协定，同时美国还动员国际社会向朝鲜提供了救灾粮食和物资，这些举动对改善美国和朝鲜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韩国，美国做出象征性的“放权”，让韩国分担责任。美国为逃避国际谴责，减少美国对韩国的主导色彩，美国将韩国军少将任命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任命韩国军人为韩美联合司令部陆军司令，还将平时作战权移交给了韩国，并让韩国承担70%以上的资金，帮助美国履行“朝美核框架协议”。这些作法充分体现了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精神实质，即借用盟国力量实现美国利益。

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是他国家利益的需要。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依存程度

已经超过了欧洲市场的依赖。因此美国需要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克服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因素，否则将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失去美国在不久后亚太时代到来之时的有利地位，同时美国也是“防止日本、中国坐大”。面对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日本在政治、军事方面“大国意识”的膨胀，美国担心其在半岛上的既得利益受到破坏，所以采取灵活措施，加强美国在半岛的地位和影响力，再者，美国想维持他主导的世界核秩序。通过缓和同朝鲜的关系，防止朝鲜核问题带来不良反应，危及美国安全。

美国当局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将继续加强同韩国的同盟关系，虽然磨擦因素会有所增加，但不会动摇。而且美国不可能彻底解决朝鲜半岛“冷战遗留问题”，它可能采取“治病不除根”的办法，否则，美就找不到留在半岛的原因，并失去一个军火销售市场，失去许多利益。

其次我们说日本，日本对朝鲜半岛占有地利的优势，当然不会放弃从朝鲜半岛上捞点油水。日本对朝鲜半岛采取的主要政策是跟随美国，伺机捞取实惠。

冷战后，日本积极推行“两个朝鲜”政策，但是由于受到美国与朝鲜的牵制而不得不放慢速度，跟随美国。日本不放弃同朝接触和对话的机遇，配合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部署，为朝鲜提供救灾援助，1996年4月17日，日本同美国发表了《美国安全保障宣言》，这意味着日本在“朝鲜半岛有事时”，可以行使他的“自卫权”，从而使日本在半岛的作用已不再仅限于经济范畴，明显看出，日本在配合美国的同时，自己也捞到了不少好处。

虽然日本的对半岛政策受到牵制，但他承认“两个朝鲜”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在安全上，日本一向视朝鲜半岛为通往俄罗斯、中国的跳板，阻止大陆势力威胁的堤坝，冷战后日本认为保持“日韩伙伴关系”，改善日朝关系，可以使半岛稳定，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在外交上，日本想成为政治大国。推行“两个朝鲜”政策，来扩大日本在半岛上的发言权，维持半岛分裂现状，防止半岛统一后飞速发展，成为第二个“日本”，与他竞争。经济上朝鲜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特殊的矿藏，日希望能够长期渔利朝鲜。

日本今后将根据美朝关系的进展来调整日朝关系改善步伐，以“接触而不结果”的方式处理日朝关系，今后可能增加对朝援助，在军事上日本会坚守“美日韩共助体制”。在军事上继续支持美、韩立场，日本绝不在经济上向韩国让步，两国的贸易磨擦不会根本解决。

最后我们谈一下俄罗斯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打算。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当然不会放弃在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企图恢复往日雄风。

自俄罗斯与韩国建交以后，曾一度采取“对韩一边倒政策”。1994年叶利钦总统提出“要恢复强大俄国”的地位，从此俄罗斯便开始对朝鲜半岛实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努力恢复俄朝关系，继续加强同韩国的军事关系，同时俄罗斯试图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试图以“不同的声音”区别于其他对朝鲜半岛事务的看法，突出俄罗斯的影响和作用。

尽管俄罗斯做出了一定努力，但依据内外形势的分析，至少在本世纪内，俄罗斯在朝鲜半岛恢复大国地位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俄国尚未恢复元气，综合国力不强，外交上缺少号召力，而且朝鲜对俄罗斯信赖程度下降，美国也会牵制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称雄”。不过，从长远角度看，俄罗斯的力量我们不可忽视。首先，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有雄厚的高技术和资

源基础，潜力很大，其次，过去朝鲜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较大，再者俄如果能走向政治稳定，经济得到根本好转，韩国为克服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会进一步加强同俄的军事合作，扩大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而又提高了俄罗斯的作用。最后，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朝鲜和韩国都不会忽视俄罗斯的这一作用。

总之，冷战后，朝鲜半岛的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日本、俄罗斯都想要在要建立的新秩序中确立有利位置，扩大自身影响。当前，在半岛的秩序上，“美国主导、日本跟随、俄罗斯想称雄”的特点已显露出来，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但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他们都不可能圆满实现战略考虑，因为他们的部分政策会受到朝鲜、韩国“自主意识”的抵制，三国之间也会相互牵制、暗中作梗。

冷战后东盟的发展

东盟，也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它作为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组织，一方面正在成为东南亚各国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并在东南亚地区的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以地区国际组织的形式来处理与主要大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关系，从而凭着它特殊的地位影响着亚太地区形势和政治格局的变化。随着东盟扩展到东南亚十国，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东盟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和对外政策的走向也将对亚太地区的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一个稳定而中立的东盟将是亚太地区甚至是全世界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1968年8月8日，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五国在曼谷发表宣言，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曼谷宣言》表明该组织的目的在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后，东盟在政治上一再重申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目标，并明确东盟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只在非东盟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东盟国家联合一致对外。然而，冷战时期美苏对峙以及印度支那地区存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东盟是难以实现建立中立区的目标的。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情况的消失，一方面使大国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失去理由说辞，而且大国对东南亚地区内事务的影响力也随着减小，另一方面，也使印支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东南亚进入相对的和平时期。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东盟在东南亚地区扮演政治主角创造了时机与条件。东盟从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逐渐地占据了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作用。1995年的第五届东盟首脑会议是冷战后东盟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意接受柬埔寨、老挝、缅甸于2000年前加入东盟，将东南亚组成一个共同体，形成一个大东盟，接收印度为对话伙伴，开始着手一些经济合作，会议的成果一方面表明东盟自身经济与政治合作的加强和力量的壮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东盟对地区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实力的加强使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具有日益增强的中心吸引作用。进行区域性经济合作始终是东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发展经济是东盟谋求内部政治稳定和增强国际地位的主要手段。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东盟在政治上的自主意识更趋强烈。尤其是近几年在人权、民主等一系列问题上抗拒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表现得特别

突出，东盟的这些变化对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继越南入盟后，老挝、柬埔寨、缅甸也相继申请加入，对于他们来说，加入东盟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国际政治地位，也意味着在经济上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有着多个有利因素，东盟的这种中心吸引作用，使东盟成为东南亚十国联盟之事指日可待，从而使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冷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消失的情况下，东盟实力的增强和地位的提高对亚太地区形势和格局的变化发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改变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改变了其他大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今后的东南亚将不再是一盘散沙，由于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共同的需要，东盟这个政治实体将维持并发展下去，并且以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形态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东盟现在随着其实力的增强而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使亚太地区的以大国关系为主导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它一方面确立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使大国难以插手该地区的事务，另一方面又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一种大国平衡的格局，同时又在大国之间扮演缓冲，平衡以及调色的角色，同时东盟在处理亚太事务中也引入了互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平等合作，协商一致的行为准则和方法，这一准则在处理多边国际关系中有利于缓解矛盾，求得共识。这对少数大国的强权政治是一种制约。

冷战后，东盟出现了一种“逆裁军”的现象，同国际裁军大潮背道而驰，并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东盟国家的扩充军事活动有增无减，已达到某种低强度的或者说是温和的军备竞赛的程度。由于东盟明确地要避免自己成为军事同盟，因此东盟国家的防务力量显得较为分散。东盟这种不搞军事同盟的原则符合其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宗旨，有利于减少地区性的军事对抗和避免卷入大国间的冲突。同时更促使东盟在政治上加强推行地区多边合作与协商的作法以政治手段谋求安全，东盟国家如何在加强自身防务力量和推动地区多边的安全合作上保持平衡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具有较大影响。

从长远看，东盟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但由于其经济水平有限，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从近期看，东盟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强自身实力，一致对外，但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发展，受到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经济上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整体经济水平不高，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而且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由于这种经济特点，东盟一体化过程将是漫长的，而一体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必将对东盟政治上的合作及国际地位产生影响。

东盟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合作的稳定有赖于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东盟在政治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各国内部面临许多政治问题，如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二是各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距较大，这种特点决定了东盟的政治合作主要在于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在许多情况下，政治上的协调与合作是出于共同安全的考虑。同时，东盟这种合作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如果大国之间发生激烈对抗，东盟是否能整体一致坚守中立还是个未知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东盟国家内部社会政治稳定性的提高，东盟在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中的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强。

随着东盟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组织规模的扩大，他在东南亚的主导地区已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新兴力量，东盟也成为各大国争夺和利用的对象。美国试图利用其特殊的军事地位限制或牵制东盟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强调安全中的大国力量平衡论，日本则把东盟作为在政治上与美国和中国进行平衡的力量加以利用，与此同时，俄罗斯、欧盟等也把与东盟发展关系作为参与亚太事务的重要途径。

对东盟来说，保持与各大国的平衡关系有利于自身的安全，也有利于地区的稳定，而且这种平衡是积极主动的。东盟这种积极的“以我为主”的大国平衡政策，使其本身也成为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影响因素。

总之，冷战结束为东盟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东盟实力的增强又使它成为亚太地区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随着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增强，它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也将更受关注，相信一个稳定而中立的东盟将是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中亚高加索——各大国争夺的焦点

苏联解体后，里海周围的中亚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各种国际势力都想插手该地区事务。特别是近来，随着俄美在北约东扩问题上斗争的暂告平息以及里海地区油气资源开发浪潮的不断升温，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和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势力加紧了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种迹象表明，该地区的未来走势和力量对比正在酝酿着深刻变化，它将成为世界战略格局调整的重要环节。

第一，中亚高加索地区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是影响欧亚大陆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亚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连接处，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势力竭力染指的战略要地，随着苏联解体后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新构筑，这块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的地区战略地位重新凸现。对美国来说，填补中亚高加索“权力真空”，夺取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不仅可以打通连接北约与美的安全保障同盟的战略通道，实现在欧亚大陆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战略部署，还可以以中亚高加索为地缘政治支点，以北约东扩和强化美日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对俄罗斯来说，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其对外战略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这一地区的未来走向对俄罗斯来说利益攸关。首先关系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北约的首轮东扩使俄罗斯在西线丧失了二千公里的战略缓冲，守住独联体这块“阵地”已成为俄与北约关系中最后的“底线”。北约在中亚高加索的渗透如果得手，对俄的安全将会造成直接威胁，这对一贯重视“战略屏障”作用的俄罗斯军事战略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其次，关系到俄罗斯的国家统一。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是穆斯林聚居地区，这里车臣战火目前虽已平息，但车臣独立的呼声却不绝于耳，其他地区的冲突也依然不断，俄如不在中亚高加索地区保持影响，无疑就会给分立主义势力提供可乘之机，而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则将面临现实的威胁。

第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利益和矛盾盘根错节，它们在该地区的力量消长，将直接影响到欧亚大陆乃至世界战略格局的未来走向。在中亚高加索地区，东西方文明汇聚，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

文化在此都有广泛影响。同时，该地区又是世界著名的“冲突链”，纳卡冲突、车臣战争、塔吉克内战此起彼伏，各国潜在的民族纠纷、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使该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另外，在这些矛盾、冲突背后都存在着大国角逐的背景，美国加紧向该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俄罗斯竭力维护在该地区的传统地位，伊朗、土耳其也想在此扩展影响。各国在该地区矛盾交织、利益碰撞不仅将影响中亚高加索的局势，也必将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未来欧亚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构建。

当前，以北约为主导的欧洲安全格局已经初步确定，亚太地区的美日安保同盟也再次得到了加强，在这个大背景下，争夺地缘政治地位十分重要的中亚高加索地区自然成为构筑新的欧亚和世界战略格局的重要环节。近来，这个地区在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它们各自施展本领，对这一地区展开争夺。中亚和高加索各国也纵横捭阖，展开积极的全方位外交，力图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中亚高加索地区成为世纪之交外交战的新场所。

第一，美国把中亚高加索视为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欧亚战略格局的战略通道，开始对中亚高加索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渗透。首先，美国提升中亚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出台新中亚战略，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关心的是俄罗斯的走向，对中亚高加索地区没有涉足过深，但是近来，提升中亚高加索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制定出对中亚高加索的新战略却成为美国外交决策层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美国认为中亚高加索地区是对美国具有切身重要利益的地区。企图支持这一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独立倾向，使该地区成为美国 21 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遏制并削弱俄罗斯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抑制中国的崛起。其次，密切领导人之间的高层接触，提升政治关系。1997 年 7 月，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三国总统相继访问美国，美国表示要加强与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合作，支持两国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塞拜疆总统的访问，美国总统克林顿多次强调阿塞拜疆是美国的战略伙伴，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外高加索地区的力量对比有所改观。

第二，俄罗斯把中亚高加索看作自己的“后院”和恢复大国地位的战略基础，竭力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首先，俄罗斯利用旧有影响和独联体各种机制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中亚高加索是俄的传统势力范围，尽管这些国家已经独立，但它们仍与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上需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维持地区平衡，安全上需要俄的扶持，有些国家甚至还需要利用俄军守卫外部边界，经济上也难以脱离与俄罗斯的关系而自主发展。目前，俄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国都有驻军，俄还与该地区国家签署了大量内容广泛的双边政治、经济等协定，借以对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其次，俄罗斯加强调整地区冲突，利用冲突“仲裁者”的身分维持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自苏联解体后，中亚高加索因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等因素而引发的地区冲突不断，前几年，俄在这些冲突中一直扮演着“纵火者”和“消防队”的双重角色，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不满，并使外部势力乘机插手这一地区的冲突调整。近来，俄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加强了调解冲突的力度，努力赢得冲突各方的信任，防止外部势力插手。比如在纳卡冲突问题上，俄罗斯改变了过去偏袒亚美尼亚的作法，积极地调停纳卡冲突。在俄罗斯的压力下，亚美尼亚的立场趋于灵活和缓和，表示不再支持纳卡地区的独立要求，承认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最后，俄罗斯还努力改善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

1997年7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到访的阿塞拜疆总统签署了《俄阿友好合作和相互安全条约》，这使近年来冷淡的俄阿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机，成为“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俄罗斯调整与这几国关系也是有所侧重的，它视亚美尼亚为盟友，把亚美尼亚作为在该地区施加影响的一个基地，对阿塞拜疆实行“怀柔”政策是为了缓和阿塞拜疆向西方靠拢的势头。

第三，其他国际势力也加强对该地区的渗透，谋求政治、经济利益。首先，土耳其积极向该地区扩展势力，力图成为地区强国。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对中亚高加索地区有着重要影响。随着苏联解体，特别是近来该地区力量的分化调整和大国关系的演变，土耳其以美国和北约为依托，加强了对中亚和高加索的渗透。利用与这一地区国家的传统文化联系进行政治渗透，力图确立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土耳其正积极地筹建“突厥语国家联盟”，吸引中亚高加索的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参加，推行“土耳其模式”，力图成为突厥语系国家的盟主。其次，伊朗为突破美国对他的“围堵”，进而扩大伊斯兰势力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影响，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行动。在抗衡美国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渗透方面，俄罗斯与伊朗有共同利益，1996年6月，伊朗与俄罗斯发表一项联合公报，称两国将“同里海地区的国家进行合作，以阻止外来势力（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1997年9月，两国的副外长又进行了会谈，强调双方将在解决地区问题中加强合作。

大国和地区势力向中亚高加索地区的渗透，使原本就不平静的地区局势增加了新的复杂因素。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国在大国角逐面前，积极推行全方位外交，力图在大国和地区力量间寻求平衡。阿塞拜疆近来的外交活动表现得最为突出：一方面，它积极向美国靠拢，与美国建立战略军事伙伴，加强与美国在经贸、政治和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又与俄罗斯签署友好合作和相互安全条约，使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同时，它又与土耳其密切接触，结成战略伙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积极在俄罗斯、美国、伊朗、土耳其等国际力量之间谋求平衡。种种综合因素的作用正在使该地区的大国关系和政治走势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新的世界政治新秩序酝酿形成的大背景下，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走势必将对世界战略格局的重新组合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章 欧洲

欧盟在中东的崛起

欧盟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多极化世界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极。在国际事务中，欧盟已经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东事务中欧盟已不再追随美国，不甘充当配角了。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摩擦、不和与对抗在不断加剧。与美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和与美国“共同主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呼声集中地体现了欧盟重返中东的强烈愿望。欧盟在中东的崛起代表着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它有效地改变着中东地区政治力量失衡的状态。因此，备受世人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一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地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为中东的石油和战略地位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争斗。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两极世界变成了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美国在消除前苏联在中东的势力的同时，大规模地蚕食鲸吞了欧盟的传统利益。欧盟与美国在中东利益上的争斗由此变得表面化、公开化了。这对新的矛盾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先的东、西方矛盾。面对日益加剧的欧盟与美国间的利益冲突，欧盟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了中东政策，加快了重返中东的战略部署。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增加了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存在，确立了独霸中东的地位。美国采取了“东遏两伊”（伊朗、伊拉克）、“西促和谈”的策略，将欧盟排斥在中东事务之外。欧盟原来打算通过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获取海湾战争的“战利品”，来换取主持“中东和平进程”的一席之地。然而在美国的强行霸道下、以色列的百般阻挠下，欧盟的愿望化为泡影。至此，欧盟觉悟了，不再充当美国中东政治帐单的“付款者”，重新塑造欧盟的高大政治形象，已成为所有欧盟国家的共识。控制中东、制约欧盟、日本和亚洲，继续称霸世界是美国的21世纪战略。美国控制了中东的石油供应，欧盟的经济必将受到美国的潜在制约。美国一方面对一些中东国家比如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限制欧盟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又将中东经济纳入美国的全球经济范畴之内，试图阻止欧盟“南下”扩展发展空间，通过对欧盟经济的限制来制约其政治的发展，面临咄咄逼人的美国战略和中东政策，欧盟奋起与美国抗衡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欧盟挑战美国的中东政策，首先，反对美国偏袒以色列。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以“救世主”自居，单独主持中东和平进程。1996年，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后，以色列政府否定了巴以双方确定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顽固地推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巴勒斯坦建国；不谈耶路撒冷最终地位；不放弃戈兰高地主权），并且于1997年批准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至此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为了维护美以的特殊利益关系和维护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美国始终没有对批准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企图扼杀中东和平进程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过压力。然而，欧盟却一再强调，1993年奥斯陆协议确立的“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是实现中东和平进程的基石，巴以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严格遵守。为此，欧盟国家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违背国际法的行径，向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提交了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扩建犹太人定居点的提案，然而这个提案遭到了美国的两次否决未能通过。但是，美国的两次否决使得不少阿拉伯国家真正认识了美国的“信誉”和“公

正”。欧盟的提案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赞赏，为打破美国独霸中东和平进程，为欧盟在中东地区发挥更多的政治作用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欧盟为重返中东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首先，谋求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美国与以色列勾结，欧盟一直无法直接参加巴、以双边谈判。但是欧盟从来就不是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局外人”。欧盟利用与中东国家传统的近邻关系，在中东和平进程启动阶段，就为巴、以牵线搭桥，积极促成和介入巴、以秘密谈判。而且欧盟承诺向巴勒斯坦人提供 6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邀请阿拉法特访问欧洲。这些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欧盟始终在谋求主导地位。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争端上，欧盟与美国的分歧已呈现出渐渐深化的趋势。欧盟不仅采取同美国有区别甚至对立的政策，而且有日益偏向阿拉伯国家的趋势。在中东和平进程处于停滞，倒退的危机时刻，欧盟代表团两度出访中东，强调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欧盟的进一步作用。法国总统希拉克更是用心良苦，展开了旨在挽救中东和平进程、加强法国、欧盟与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关系，扩大欧盟的政治影响与作用的外交攻势，以抵消一些美国的霸主行为影响。为了保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欧盟向中东地区派遣了特别协调员。这是欧盟决心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实质性行动，也是挑战美国独霸中东和谈的具体步骤，阿拉伯世界认为。“当今的欧盟在中东问题上已不再沉默，开始敢说并且敢做了。其次，欧盟建立“新地中海战略”。“东扩”与“南下”是欧盟面向 21 世纪的重要战略决策，在“东扩”中，人们不难发现有欧盟屈从美国的阴影。然而，“南下”则是欧盟针对美国倡导的中东北非经济合作区，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与美国争夺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果敢举措。

自苏联解体退出中东地区后，美国成了中东地区政治、军事的超级霸主，使中东国家陷入极为不利的困境。而对美国一系列高压政策，中东国家期望欧盟迅速崛起，以打破美国独霸中东的局面、美国支持以色列拥有巨大的核武器库，却强烈反对欧盟、俄罗斯向阿拉伯国家、伊朗提供民用的核反应堆技术，这也迫使中东国家进一步倒向欧盟。同时，中东国家与欧盟也是安全的战略伙伴。自然地理将中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亚洲，一部分在非洲。但是，很多阿拉伯高级政治战略学者却认为：依据长远的政治利益、经济互补的需求和远大的发展前景，中东地区应划归到欧洲的政治、经济范畴之内。中东国家与欧盟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经济的交往。而且在苏联崩溃后，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团，应该寻求与另一极世界力量的合作，而新近崛起的欧盟是最为理想和安全的战略伙伴。中东国家期望战略合作伙伴欧盟“一极”能迅速崛起。

在多极化世界中，欧盟一极在中东事务中重要的政治、经济作用已经日趋明显。欧盟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冲突也日趋激烈。由于美国竭力袒护以色列、制裁两伊（伊朗、伊拉克）的中东政策，大部分中东国家与美国积怨甚深。欧盟利用其有利的地缘政治优势，努力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全面伙伴关系，赢得了广大中东国家的积极响应。现在欧盟和中东国家都深刻地认识到，为了抵御美国的霸道行径，全面加强双边合作已是欧盟和中东国家共同的战略选择。因此，欧盟在中东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而欧盟在中东的崛起代表着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改变着中东地区政治力量失衡的状态。而欧盟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

世纪之交的中东走向

中东地区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举世瞩目的“热点”地区。进入 90 年代后，以海湾战争和 1993 年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协议两件世界性大事为契机，长期困扰中东各国的紧张局势趋向缓和与稳定。

从总体上看战后几十年中东形势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始终起作用并影响着中东局势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第一，超级大国的相互争夺的战略调整。中东地区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给合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东地区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矛盾与纠纷，使各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给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与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更是将中东视为各自全球战略的重点地域。它们或者是建立势力范围，挑动集团间对抗；或是扶植各自的代理人，拉一派打一派，从中获利。战后数十年中东战火不断，危机频繁，究其原因无不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有关。超级大国间的争夺是影响中东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地区大国的对外战略影响中东局势发展。中东地区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雄踞广阔的地域，强盛数百年的王朝和帝国。到了近代，中东国家虽然大都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但素有反对外来列强侵略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从未停止过复兴阿拉伯家园的抗争。这一斗争使伊拉克、也门、苏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先后获得了独立。数十年后，伊朗、伊拉克、埃及等中东国家一直表现出他们要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倾向。中东地区大国群雄并居、盘根错节的关系，是影响中东局势发展的又一因素。

第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发展对中东和平起着重要作用。中东的民族、种族、部族、世界等矛盾错综复杂，成为战后世界政治版图“热点中的热点”。但中东问题的核心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其实质就是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前途直接影响中东局势的缓和或紧张、战争或和平。战后中东地区发生过十数场大大小小的危机或战争，其中 5 次大规模中东战争都因巴勒斯坦问题而起。事实证明，巴勒斯坦问题一天不得到全面、公正、合理的解决，中东就一天不安宁。因此，巴勒斯坦问题是观察中东时局走向的标尺之一。

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大转换，原来影响中东局势的诸多因素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它们共同作用并推动中东大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首先，美国拥有影响中东局势的主导权。随着冷战的结束，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已不能同昔日的苏联相提并论。与美国的影响力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这一根本性的外部力量失衡，使美国可以全面和广泛地介入中东事务，力求使中东局势朝美国愿意看到和认可的方向发展。美国对世纪之交的中东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相对稳定的中东。中东仍是冷战后美国谋求主导世界的前沿，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九十年代初，针对世界格局出现的新变化，美国进行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在逐步缩减驻欧洲军事力量的同时，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美国国防部在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同中东有着盘根错节的重要利害关系。中东是欧洲和地中海同非洲、亚洲和印度之间的空中和海上的交通枢纽。因此，它对美国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投放军事力量起着重要作用。维护中东地区相对稳定的局面，确保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

主导权，是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方针。从 1993 年巴以和平协议签署后，美国一直以“第三方”身份在尽力推进协议的逐步执行。每当巴以双方在执行协议时出现矛盾或在原来立场上倒退时，美国就运用他占据的主导地位进行调节。同时，美国也确保中东地区各种力量的平衡。积数十年的经验，美国知道在阿拉伯国家中没有美国“真正的盟友”，要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除坚持一贯的偏袒以色列，强化美以同盟的传统做法外，还要充分利用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因此，美国对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分化和区别对待政策。近年来，美国一方面加紧拉拢阿拉伯国家中“温和势力”如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发展同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关系。另一方面，对与美国唱对台戏持强硬立场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采取“铁腕政策”进行孤立、封锁和排挤。如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继续对利比亚进行国际性制裁，对伊朗搞颠覆活动等。美国对上述国家的强权政治虽遭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但美国认为这是防止地区大国势力做大的根本途径。

其次，阿拉伯国家联合、团结愿望有了进一步增强。中东局势有希望走出一个较长时期的缓和——对抗——稳定的发展方向，这同近几年来中东国家加强地区合作，增强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意识不无关系。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国外都是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有相似的遭遇，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数十年的阿以矛盾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但阿拉伯国家追求联合自主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埃及、叙利亚等国一直在谋求阿拉伯世界的团结。这几年来，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和自主迹象更加明显。各国都表明反对外来势力插手和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主张阿拉伯国家的事情由阿拉伯人自己解决。因此，近几年来美国在中东许多问题上碰壁。如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对伊朗搞颠覆活动，就遭到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的反对。同时阿拉伯各国也相互协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巴以协定立场上倒退的行径，阿拉伯国家表现出空前团结和一致的立场。1997 年初，当以色列政府准备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致使阿以矛盾再度激化时，阿拉伯国家通过各种方法，促使联合国在 199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 10 届紧急特别联大，并且通过了谴责以色列在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兴建犹太人定居点的决议，使以色列空前孤立。这是海湾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首次集体行动，国际影响很大，初步弥补了因海湾战争造成的阿拉伯世界分裂所带来的阿拉伯事业的损失，它是阿拉伯国家走向团结的象征。最后，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在曲折中前进，奠定了中东局势朝缓和方向发展的基础。1993 年巴以协议签署后，尽管离全面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目标还很远，但总的趋势是缓和对话。根本一点在于经过数十年的斗争，巴以双方都厌恶战争和暴力，和平已是双方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尽管执行巴以协议的每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和平的车轮一直在前进，只要各方真诚努力，巴勒斯坦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同时，以色列与他的主要邻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将使中东局势朝好的方向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走向世纪之交的中东将出现较长时期的缓和与稳定时期，因各种条件对和平有利，但是仍存在着影响和平的不利因素。首先是渐成气候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对中东的冲击。中东国家大多信奉伊斯兰教，80 年代以后，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这一块区出现了一股复兴伊斯兰、倡导以伊斯兰文化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思潮。其中一股极端主义势力主张以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实现目标，他们对内主张推翻政权，对外

排斥外来民族（如犹太族）和外来文化（如西方文化），这种极端主义势力到处挑起事端，制造矛盾，搅乱政治秩序，并且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成为影响中东和平的新的不稳定因素。其次，耶路撒冷的地位之争也是一个不利因素。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它的归属和地位一直是悬而难决的问题。1997年年初，以色列执意要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引发了巴以双方紧张对峙的局面。同时，伊斯兰国家也反对以色列的错误行径。后来，虽然经国际社会及有关国际调解，巴以关系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但这一事件已经暴露出中东和平的脆弱性。因此，中东各个国家都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走向21世纪，开创一个属于中东人民的新纪元。

北约东扩

近两年来，北约东扩的势态发展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北约东扩是美苏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的第一件有着牵动全局意义的大事件，它不仅对当事者，也就是欧洲、美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必然会对世界格局未来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在北约东扩的背后，或许冷战结束后世界重新组合的某些新的要素正在形成。

中东欧地区的地位，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150年来这一地区在安全属性上对世界政治起着关键的影响，这一地区历史上屡次成为大国争霸的抵押品。这一点也构成了北约东扩的战略含义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北约东扩是美国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基本态度，在美国人的战略思想中，北约东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未来发展方向并不确定的俄罗斯起到一定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对欧洲内部的力量分布也是一种约束，美国在北约东扩中的态度是积极的。1989年，针对德国统一的局面，美国布什总统领导的政府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应是北约组织成员，并在以后始终坚持此原则，可以说，北约“东扩”是从德国统一那一刻起就已开始了，而且美国是始作俑者。

此后，随着华约解散、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美国重新提出北约东扩，并且得到实施。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本质上是西方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了遏制苏联而结成的军事联盟。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政治上的对抗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事实上，美国没有因为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政府宣布进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便消除了安全方面对俄罗斯的疑惧。近年来，美国国内有关北约东扩的争论相当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认为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政策是不确定的。认为俄罗斯的未来捉摸不定。事实表明，仍然将俄罗斯看作一种潜在的威胁是美国推动北约东扩的重要原因，而且这还决定了美国在与北约东扩有关的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想一想，俄罗斯保留的3000多枚核弹头，即它仍具有将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和工业区摧毁好几次的力量，而且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国家，便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执意要北约东扩。在北约成立之时的美国领导人认为，北约成立除了要遏制苏联扩张外，还要通过军事威慑来影响东欧的形势，所以当苏联解体后，美国并无意放弃利用北约影响那里形势的愿望。而且近年来的形势也为北约东扩提供了很多理由，如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和左翼力量回潮、动乱和种族冲突，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长达数年的战争等等，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只有将北约向东扩展，才能确保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不致于倒退；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纠纷不致于蔓延或引起大国的冲突，像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过的那样；俄罗斯的势力不再能卷土重来。

总而言之，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地促成北约东扩。

在北约东扩中，俄罗斯的因素虽然不是北约加快东扩速度的唯一动机，但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形势和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它与西方越来越多的矛盾，从反面刺激了北约东扩意图的明确和加强。而从另一方面看，俄罗斯就其影响、作用和价值对西方都显得特别重要，因此，俄罗斯对东扩的阻力，虽不能阻止北约东扩，也不能使东扩的进程放慢，但至少也会影响西方在扩大“冷战胜利成果”时的政策。

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向何处去。尽管俄罗斯的民主派试图给予保证，但目前为止答案不能令人满意，俄罗斯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核扩散、民族冲突、难民外流等等令西方忧心忡忡，西方不准备给俄罗斯他所期待的大国地位，俄便准备自己来实现他，比如加强对独联体地区的控制，推动与中国等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通过出口军火和某些高技术来解决资金困难，而这些出口对象也包括那些美国所不信任的国家。俄罗斯这些对外政策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对他的不信任感，二者的矛盾就这样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北约东扩计划也因此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由此又导致了双方在欧洲安全格局上的斗争。

在欧洲建立均势是俄罗斯外交的传统和指导思想。在力量削弱的情况下这对于俄罗斯的安全保证就显得更加重要，俄认为，北约东扩不仅破坏了其在欧洲实现均势的计划，而且对俄具有灾难性的影响，第一种影响是直观的，也是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对东扩最本能的反应，这便是东扩威胁了俄罗斯的地域安全，东扩针对的正是对于俄罗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安全带，使俄西部边界直接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的压力，第二种影响是潜在的，然而却可能是最关键的和最深刻的，不仅关系到东扩，实际上也关系到俄罗斯的发展方向，俄民主派们认为北约东扩意味着在俄西部建立起一道“柏林墙”，阻断了俄罗斯向西方化发展。

冷战后最先提出加入北约的是东欧国家，东欧为什么急切地希望加入北约，为什么他们首先成为东扩的对象是北约东扩中的重要问题。由于东欧在地理上的特殊地位，它是西欧向东扩展的基地，也是俄国进入欧洲中心的跳板，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欧洲外交、军事和政治斗争的舞台，是欧洲列强的争夺对象，从未摆脱过在安全上依附某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命运，再由于东欧国家领土、民族纠纷复杂，列强势力的此消彼涨导致该地区领土变更频繁，东欧国家之间、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矛盾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这种情况多次导致危机局势，也迫使东欧国家在安全上寻求强国或强国集团保护，历史上沙俄在东欧的侵略、干涉和统治使一些东欧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反俄心理，他们渴望加入北约。

北约东扩为未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投下一个大的变数，也会成为战后新东西方关系中的一大悬案，未来的局势发展变化莫测，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基本上是理性应对的，而且，可以认为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谈判中获得了与其实力相称的收益。虽然北约与俄罗斯达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妥协，但俄罗斯仍将东扩的北约看成是古荷马史诗中特洛伊之战中立下神功的木马，双方根本的政治利益上的差异或冲突并未获得最终解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搞了一

个联盟宪章，当时也把西方吓了一跳，但俄罗斯并未想建立一个新帝国，只不过是一方面用它来缓冲一下北约东扩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对国内压力交待一下罢了。

欧盟“新地中海战略”

冷战结束后，欧盟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又挥师“南下”，制定了所谓“新地中海战略”。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同种族主义作斗争，防止核扩散而定期进行政治对话等；经济和金融伙伴关系，欧盟将通过增加经济援助，帮助地中海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确定双方未来合作目标，即于2010年建立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社会和文化关系伙伴关系，涉及到控制移民，打击犯罪以及同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活动作斗争等方面的内容。欧盟的这一“南下”计划已经付诸行动，并且取得了一定进展。

1994年10月，欧盟首次提出同地中海南岸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倡议。年底这一倡议得到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议的一致通过，并很快得到地中海南岸国家的广泛响应，欧盟的“新地中海战略”由此出台。1995年11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欧洲——地中海27国首脑会议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发表了共同宣言。根据“宣言”确定的目标，双方将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新型伙伴关系”，使地中海地区成为一个和平、稳定的繁荣区。双方一致认为，这是一项“头等重大的事件”，是“建设稳定、合作和安全的欧洲与地中海空间的历史性机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近两年来，欧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首先，欧盟加快与南岸国家签署联系国协议的谈判进程。第二，加强与申请加入欧盟的地中海国家的谈判进程。第三，召开欧洲——地中海国家首脑会议。第四，建立定期政治对话制度。于1994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地中海对话和合作论坛”，1995年的第二次会议确定“论坛”的宗旨：“就地中海沿岸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非正式对话”。“地中海论坛”已成为当今地中海南北国家高层领导人进行定期对话磋商的重要场所。

从上面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新地中海战略”出台时间虽然不长，但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进展。欧盟在冷战结束后推行的这一战略有一特殊的政治背景。首先，欧盟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地中海地区是欧盟的南大门，是当代世界暴力和武装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地中海南岸国家形势动荡不定，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战略需求下降，力量收缩，使地中海南岸地区在冷战时期掩盖的各种内部问题日益突出，民族、边界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各种宗教狂热、恐怖活动、暴力事件、非法移民等已殃及欧盟南部成员国。从而对欧盟的稳定以及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构成直接威胁。欧盟为求取自身的安全和发展，迫切需要在地中海地区建成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其次，欧盟希望能够取代美国，夺取地区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苏在该地区的对抗，争夺局面已不存在。对美国来说，地中海地区的地位随着下降，它的力量处于逐渐收缩的态势。在这个背景下，欧盟则借助于地缘上的优势趁虚而入，快速出击，力图排挤直至取代美国，将该地区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以扩大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发挥欧盟在该地区的主导作用。再次，欧盟企图以“南下”平衡“东扩”，缓解欧盟内部矛盾。随着东欧剧

变和苏联解体，欧盟的注意力即转向东部，将其政策重心放在中、东欧国家。在德国的竭力鼓动下，欧盟制定了东扩计划，并为此不惜耗费巨大财力和物力。很显然，欧盟“东扩”主要满足了德国的需要。欧盟在政策和财政上向东倾斜，不能不引起欧盟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法国等南部成员国的忧虑和不安，这是因为中、东欧国家是德国的近邻，如果吸收他们加入欧盟，虽然欧盟其他成员国也会从中得益，但德国从中得益大于其他成员国却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德国一直是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如果“东扩”目标一旦实现，将有可能形成以德国为中心的“大欧洲”态势，并势必由它主导着欧洲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使欧洲成为“德国的欧洲”，这种局面一直是法国等其他成员国最为担心和不愿看到的。因为法国等欧盟国家盼望的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法国、意大利等南部成员国竭力鼓动“南下”，欧盟南下地中海战略随之出台。推行“南下”战略，尤其将会给欧盟南部成员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巨大好处，同时又能起到平衡欧盟“东扩”的倾斜战略，起到抑制和抵消德国在欧洲影响的目的。总之，欧盟“新地中海战略”的出台，有独特的内外背景，它既会带来眼前利益，又符合欧盟的长远利益要求。

欧盟“新地中海战略”计划虽然已经启动，但就目前而言，它还只是一种战略构想，要想使构想变为现实，还必须克服许多阻力和困难，就当前来看，政治上还存在不利因素。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区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的成功。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地中海南岸地区形势一直动荡不安，成为当今世界最不安定的地区之一。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既有超级大国美国的插手，又有复杂的内部原因。冷战结束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以及阿拉伯内部相互之间的民族矛盾、世界纠纷及宗教冲突依然严重存在，而且不断升级。欧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近几年来，正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为了争取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发言权，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主动改善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像解除禁令，领导人出访等一系列行动，努力改善和加强它同南岸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欧盟的积极干预和推动下，中东国家目前正通过加强相互交流和高层领导人的会谈接触，使矛盾正在趋于缓和。只有首先实现中东国家之间的政治和解，使地中海地区成为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才谈得上建立一个繁荣的地区。从目前来看，中东和平进程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通过各方的继续努力，会逐步排除各种障碍，前景还是乐观的。

欧盟“新地中海战略”如果实现，将大大增强欧盟的实力，从而又会进一步加剧西方大国之间在全世界的竞争。80年代以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的新条件下，西方大国之间的各种竞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决定政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各大国要想在未来的多极格局中占据重要的一极，在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必须依仗强有力的经济做后盾。因此各发达的西方大国加紧经济竞争，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大国加紧营造以它为中心的排它性地区经济集团，使地区经济集团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加快建立和发展，集团之间的竞争随着更加激烈，即各大国利用这些集团作为自己争权霸权、政治优势的工具。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各大国加紧制订扩张战略，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为在未来的国际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基础。

欧盟推行“新地中海战略”正是欧盟为推行其全球战略试身、做准备，

欧盟积极谋求在国际新秩序中占据主要地位，并为此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进行了一系列较大的举措，像“东扩”、“南下”实施“新地中海战略”都是欧盟为扩大自身实力，增强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争夺的实力和筹码，积极地做准备。

俄罗斯国家的安全战略

国安安全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政策的重要内容，从他涉及的面来看，通常包括对内和对外两大方面，我们这里主要讲对外部分。今天俄罗斯的安全战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本土为核心。领土是国家行使其主权的空间，也是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的生存范围和物质财富的来源与基础。没有领土，就没有国家，离开了领土的安全，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即使是部分领土的丧失，国家不能统一，或者领土受到威胁，都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侵害，几乎每个国家都将本国领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内容。保卫本国的领土安全需要一定的外部空间，因此本土安全往往与外部密不可分。但是一个国家实施对外安全战略并不是国家安全的最终目的，而是保卫本国安全的手段。实施对外安全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确保本国安全。本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小范围，任何国家都把本国领土的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考虑和选择，即使是对于象美国这样对外政策表现为进攻性的国家，他们往往把对外安全、对外扩张势力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但他们也是在充分地、有效地保障本土安全的前提下，实施其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而对于以防御为国家安全战略主体性的国家，无不把国家的本土安全作为国家整体安全的首要环节。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一直表现为一个历史性帝国，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战略，外侵、外扩成为其历史的主旋律；今日俄罗斯战略力量大为收缩，对外政策重新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基本上表现为防御性特征。

第二，把独联体作为其对外安全战略的关键。独联体国家是在原苏联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他们与俄罗斯在地理、民族、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共同生活联系和生产协作关系。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为缩小。俄罗斯认识到，在目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自己已不可能重新将中欧、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失去东欧的情况下，独联体已再不能失。一旦失去了独联体，俄不仅难保大国地位，而且自身生存、安全也受威胁，而相反，控制独联体，则可以作为与北约抗衡的依托，并可把它作为重振大国地位的基地，俄罗斯认为，俄罗斯的安全与其他独联体国家安全密不可分，俄罗斯的稳定取决于独联体的稳定。俄邻国的动乱，将波及俄罗斯自身，并有可能使俄卷入严重的地区冲突。因而，加强独联体的安全合作对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俄把独联体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区，声称在该地区具有“最切身的利益”，并“负有特殊责任”，把独联体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让西方等外部势力插手。希望以独联体国家为外交重点，建立“现代地缘政治实体”，使其成为保卫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屏障。

第三，把欧洲作为其主要的战略方向。俄罗斯虽然横跨欧亚两大洲，然而欧洲部分才是其民族与历史的发源地，至今其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生产、

生活等活动都主要集中在欧洲部分。从俄罗斯的周边安全环境看，北、东、南多天然屏障分布，只有欧洲方向为广阔平原。而且在俄罗斯的周边国家中，亚洲方向多数是贫穷弱小的国家，无力威胁俄罗斯安全，只有欧洲是强权所在，成为威胁的根源。历史上，俄罗斯与欧洲西部方向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是其对外关系的主流，而今天仍未改变，欧洲仍是俄罗斯安全的主要战略方向。欧洲做为世界政治和战略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世界政治格局的长期演化后，欧洲，尤其是西欧成力世界一极，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特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中，西欧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积聚着强大的能量，而且对外政策团结，又使欧洲赢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俄罗斯认识到，在面临重振经济、恢复政治地位的困境中，西欧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要借助西欧的政治、经济、科技力量来恢复本国经济、平衡欧洲安全、协调欧洲事务。对俄罗斯而言，东欧历来是他的传统势力范围。甚至在观念上，早已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东欧的演变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苏联的演变，又直接改变了俄罗斯西部的军事安全环境，使俄罗斯在西部和西南部丧失了两个战略梯队和 1000 多公里的缓冲地带。俄罗斯认为，冷战已结束，北约没有必要存在下去，然而现在北约不仅不采取措施让其消亡，反而乘机东扩，将北约防线推进到俄罗斯的大门口，这不仅影响到俄罗斯对该地区政治、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而且对俄罗斯安全也构成威胁。如果中欧、东欧国家加入北约，成为战略上与俄直接对抗的国家，或者成为反俄国家的跳板，都将严重损害俄的切身安全利益。俄罗斯从自身安全需要出发，努力阻止北约东扩的所有举动。

第四，亚太地区是重要周边，东亚为主要对象。俄罗斯联邦从原苏联脱胎后，在对外政策上曾一度推行全面倒向西方的政策。然而西方对俄戒心很重，口是心非。西方一方面表明要给予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却又设置了重重障碍，俄在与西方的合作中四处碰壁，经过多次挫折，俄政治领导人逐步在国际事务中成熟，外交由依附型向全方位平衡外交转变。俄强调其政治特征是“双头鹰”，既注视西方，也注视东方。俄罗斯看到，目前美国、日本、欧盟在世界经济、国际事务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是脱离不了的重要支持对象；但是，亚太地区国家也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俄不仅要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必须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合作。与亚太地区国家国际地位日益增长的趋势相比，俄地位急剧下降，俄罗斯作为亚洲的邻邦，而且在亚洲具有广阔领土，自然不愿意放弃他在亚洲的地缘优势，希冀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中，积极参与，带动他亚洲地区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全面改善安全环境，提高自己在世界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尤其是东亚地区；是目前俄亚太安全战略的核心。

第五，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是俄罗斯的合作对象。冷战后，世界格局演化为“一超多强”的式态。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安全中掌握主导权。俄罗斯为在欧洲乃至世界的事务中赢得更多的主动权，需要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因而强调在安全领域与美合作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的变化，使俄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条件和环境；两国由战略对抗走向战略合作，曾达成“战略性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起源并且定位于军事与安全的需要，然而，战后军事因素的重要性下降，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相对提高，美俄基于军事合作而建立起来的伙伴关系具有片面性和脆弱性。随着时间推移，两国围绕美对俄援助问题、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器技术转

让问题，北约东扩等欧洲安全问题等的矛盾日渐显露，美俄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开始上升。事实表明，美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并且是以美国利益为前提的。一方面，从长远角度出发，美国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稳定的“最需要”的政治、经济力量。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在世界政治舞台、国际经济市场以及其他方面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俄美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这主要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旨在确立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在世界上军事优势，防止其他国家加强军事力量和扩大影响，最终建立和维持以美国军事优势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谁破坏这一秩序，谁就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俄罗斯始终被美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冷战时以苏联为对手，现在仍把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军事威胁，并认为俄对欧洲和东亚的局势产生了消极影响，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实施战略优势政策，在俄美关系中，甚至在同其西方盟国的关系中，都排除了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俄罗斯更不可能赢得与美平等的地位。而且，俄美之间没有建立伙伴关系的基础。俄美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共同的对手，妨碍了两国在安全领域形成共同利益，也排除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因此，伙伴关系是表面的，而非实质性。这几年的实践表明，俄美安全合作貌合神离，他们在矛盾中合作，在合作中对抗。

综上所述，今日俄罗斯的国家战略，一反过去传统，表现为防御型。其战略思想、理论上也同以往不同，突出强调本国、本民族利益至上。在其战略思想、方法、手段等方面以及战略实践中，都体现出浓重的地缘政治色彩。本国领土的安全是俄战略考虑的根本核心。在外部环境中，独联体是一个关键的要害地区，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欧洲是传统的战略方向，列为战略重点；亚洲太平洋地区也是其战略考虑的重要部分。美国由于他在世界格局中的特殊地位，被俄视作安全合作的对象。

虽然俄罗斯的安全战略转为防御型，但俄罗斯却不甘于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国际影响力的削弱，俄罗斯正在各个方面努力，企图重振大国雄风，恢复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俄罗斯渴望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找回往日的骄傲。

法国的外交战略

自从 1958 年戴高乐建立第五共和国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大国地位，就成为法国对外政策始终不渝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然而法国是个中等国家，要起大国作用必须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一个能充分借助各种国际力量、发挥自身优势的外交战略。戴高乐为冷战期间的法国制定的一套外交政策，使法国享受到“持二等车票，坐头等车厢”的待遇，原因就在这里。随着冷战的结束，这套外交政策赖以建立的两个前提条件，即美苏争霸和德国分裂已不复存在，致使法国外交一时处于难以适应的困境。1995 年就任总统的希拉克，经过深思熟虑，逐步推出一套旨在适应冷战后形势的新戴高乐主义对外政策，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这套新政策大致包括对欧政策和全球战略两个部分，总目标仍是依托欧洲，在世界上起大国作用。

依靠法德联盟，把欧盟建设成多极世界的强大一极，始终是法国对欧政策的首要任务，但与以往政策相比，具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法国在坚持法德联盟的同时，强调要同英、意等国建立侧重点不

同的“多重联盟”。冷战结束后，密特朗依靠排它性的法德联盟，加速欧盟建设，试图以此将德国拉在欧洲联盟中，防止统一后的德国向东扩展势力，谋求霸权。但这一政策适得其反。恢复了统一和完全主权的德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了法国争夺欧洲事务主导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法国在法德联盟和欧盟中的地位却明显下降，在许多问题上被德国牵着鼻子走。因此，希拉克上台后就表示要重新考虑同德国的“特殊的欧洲关系”。近年来，法国积极地同英国加强了以核防务和军事合作为重点的关系，同意大利和西班牙组织南欧联盟的活动也明显加强。法国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通过这种“多重联盟”，在欧盟内部建立起新的力量均势，使法国在欧盟中处于中心地位，以恢复它对德国的政治优势。

第二，法国不仅坚持南下，而且还要东进。前一时期，法国以向欧洲南部和地中海发展势力来平衡德国向东扩展，现在法国意识到，这等于默认东欧是德国的范围，况且现在北约和欧盟东扩已是大势所趋，法国如果只强调南下，必将对法国今后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带来不利影响，希拉克决定改变前期的做法，积极支持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要求，并利用东欧国家尚存的“恐德心理”和“潜在的亲法情绪”，发动攻势，“重返东欧”。此后，希拉克连连出访东欧，是为了使法国“把脚牢牢迈进东欧的大门”，取得同德国共同主导东欧事务的地位。

第三，法国还改变对北约的态度，争取参加进去，促其改革的策略。冷战结束后，法国对建立欧洲独立防务过分乐观，在北约改变职能、扩大防区等问题上一味采取反对态度。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法国进一步丧失对美国和北约的影响力，德国得以坐大，成为美国的“领导伙伴”。希拉克上台后主动靠拢，并且明确指出，法国愿意重返改革后的北约，但改革后的北约应该建立在北美和欧洲两个支柱上，由欧洲和美国分享领导权。

反对单极世界，实现世界的多极化，是法国全球战略的中心思想。它的行动方针是：借助各种国际力量，使法国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建立以多极化为特征的世界新秩序的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希拉克承认现在欧洲还离不开美国，法美之间仍需保持良好的盟友关系，但他也明确指出，“法美关系一向是，而且将永远是相互冲突的”。美国在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后，不允许世界上出现能够向美国霸权地位挑战的世界大国甚至地区大国，执意建立由美国一国“独揽国际事务”的世界新秩序，在世界各地排斥欧盟国家的存在和影响，成为法国施展大国抱负的主要障碍。因此，希拉克上台后，公开打出反对美国霸权的旗帜，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展开争夺。

首先，推动欧——亚结成“战略联盟”，实现欧——亚——美大三角的均衡，构筑未来世界新秩序的主体结构。法国对美国一手控制大西洋联盟，一手控制亚太地区，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政策心存疑虑，认为这种发展前景对欧洲最为不利。它一直在寻求机会加强欧——亚这薄弱的一边，使欧——亚两极建立起同美——亚两极之间不相上下的密切合作关系。1996年初在曼谷举行亚欧首脑会议，法国对此高度重视，希拉克亲自出马做了许多推动的工作，力求通过这次会议使亚欧国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和直接对话的论坛，并且希望利用亚欧会议这一组织形式将亚欧合作不断推向前进，建立政治、经济等全面的合作机制，实现欧——亚——美三角关系的均衡发展。

其次，法国谋求与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大国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视它们为法国发挥大国作用的主要借助力量。希拉克对这些国家奉行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减少磨擦的政策，以期联合“多强”，遏制“一超”。对中国，希拉克看重中国的大市场以及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积极推动欧洲同中国关系的发展、希望同中国建立“长期的政治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俄罗斯，希拉克认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然是国际事务中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也是欧洲安全和稳定的一个潜在的合作者。因此，他积极致力于法国和欧盟同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伙伴关系”。对日本，希拉克认为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正在成为政治大国，是法国在亚洲的“天然联系国”，法国应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甚至是战略联盟关系，以期拓展日本市场，扩大法国在亚洲的存在，在美欧亚三角之间建立均衡的关系。

第三世界政策也是法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方针是，努力扮演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扩大法国在亚非拉的存在和影响。希拉克很清楚地知道，“法国只有在北南地缘政治轴心中保持住大国地位，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

自从希拉克推行这项新的外交战略以来，法国的外交处境有了明显改善，尤其是他态度鲜明地打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极世界的旗帜，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动外交攻势，大大地增进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为法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新秩序占据有利位置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第三章 非洲

冷战后，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使非洲受到巨大冲击，政治、经济形势都十分严峻。但近几年来，非洲出现一些积极的重要的发展趋势：和平稳定趋势增强；联合自强发展经济，多方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地位上升，国际资本开始转向非洲。这些发展趋势，对非洲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利。然而，非洲所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仍将是艰难曲折的。

首先，我们说说和平稳定趋势增强了。冷战结束不久，由于苏联解体，中东欧剧变，西方国家强制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气候下，非洲许多国家源自殖民地时代的领土、种族、宗教等矛盾一并突出和激化起来，于是政局动荡，战乱频频发生。从1990年到1994年，非洲内战与冲突连年呈上升趋势。冷战时期存在的内战更激烈的进行；新的燃点又接连发生；利比里亚内战突然爆发，西非一些国家政权更替，非洲之角索马里内战剧烈爆发，导致有的国家政权易手和新国家成立；中部大湖地区种族屠杀空前残酷的进行。“多党民主”浪潮冲击下造成的派系林立，政党纷争和因此而引发的小规模的矛盾冲突则此起彼伏。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非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然而自1994年以来，形势逐渐趋于平稳，和平稳定的趋势增强。利比里亚经过8年的打打停停，终于实现了停火，现正准备举行大选；索马里的战乱也已降温，有关的各方都愿谋求妥协；大湖地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战火中诞生。许多国家政党林立，群雄争霸的局面也有所改变。更为突出的是，长期困扰着非洲和有关国家人民的重大难题和大规模的内战都已经或正在得到解决。例如，1994年新南非在选举中诞生，不仅消除了南部非洲长期动乱的根源，也为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增添了一个强大的积极因素。1994年4月11日，安哥拉国内组成了安哥拉历史上第一届民族团结与和解政府。宣告非洲大陆持续时间最长，使190万人丧生，300万人沦为难民的一场内战的结束。

与人民的意愿相适应，非洲依靠集体力量自主解决冲突、维持和平稳定的努力在不断地加强。1993年非统第29届首脑会议正式通过建立“预防、处理和解决非洲国家内部冲突的安全机制。”1996年7月，第32届非统首脑会议又一致强调要把这个安全机制建成常设机构，使之在维护非洲和平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期间，中部非洲11国还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非洲一些次区域性组织也通过小型首脑会议、协商和对话会议等方式调解各自地区的冲突和危机。通过谈判或对话调解冲突，这已成为近年来非洲国家解决地区冲突较有成效的举措。

苦难的历史和现实使非洲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和平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冷战因素的逐步消失，也使这一共识的实现具备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非洲人民的共识以及和平稳定趋势的增强，对今后非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其次，非洲国家正在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冷战后，西方国家鼓吹的“多党民主”浪潮曾一度席卷非洲大陆，到目前为止，53个国家绝大多数都举行了“多党民主”选举。有些国家没有照抄照搬或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是采取比较稳妥的政策措施，有准备有秩序地进行多党选举，都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稳定，也推进了政治民主化。但是不顾本国国情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并且仓促举行多党选举，都无一例外地形成政党林立，党派纷争，

民族矛盾激化，从而导致政局动荡，经济也遭到破坏。然而，不管结果怎样，从根本意义上说，它是非洲人民在冷战后政治民主化的尝试和探索。他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经验教训，推进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 1991 年 6 月非统第 27 届首脑会议上正式签署了“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各国为加速一体化进程都努力发展经济，联合自强发展经济意识得到了加强。在联合自强的同时，非洲的一些政治家和有识之士也把目光转向经济蓬勃发展的亚洲和其他地区，开始注意研究它们的发展经验，并打破主要同欧洲保持传统关系而加强同亚洲等国家发展经贸合作。这种向多方学习和借鉴来发展自己的做法，是非洲更加成熟的表现，而这一觉悟的实践，对非洲今后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再次，近年来非洲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逐渐上升。近年来，随着非洲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和西方大国国际竞争的发展，非洲的重要国际地位和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非洲有丰富的资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具有巨大潜力的资源和商品市场，目前非洲的私人投资也比以前有大幅度增加。此外，非洲有 53 个国家，在联合国成员中占近 1/3，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的作用也日显重要，这些因素都促使西方国家重新关注非洲并重新开始对非洲市场的争夺，尤其是法国、美国之间的争夺呈激化之势，日本、德国也相应地加强了对非洲的经济外交。西方大国重新关注非洲，无疑会为非洲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它意味着更多的资金、技术和商业机会，都将会使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上拥有更大的发展机会。但另一方面，它们关注并按各自利益插手非洲事务，给非洲国家解决固有的领土、宗教、民族等矛盾的努力增加了许多复杂因素。它们有选择的重点援助政策也会促使非洲国家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加剧非洲国家的分化。所以大国重返非洲进行争夺，对非洲有喜有忧。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非洲和平与发展的道路还很艰难曲折。非洲的上述重要发展趋势，表明非洲充满希望，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它真正地实现和平与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障碍。

第一，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给非洲留下的裂痕很难轻易愈合。冷战后非洲局部的动乱从没有间断过，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定因素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仍会激化。这是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宗教、民族等矛盾还未根本解决；而新的矛盾和斗争又不时出现和发生，尤其是外部势力继续向非洲施压，以种种手段干涉非洲内部事务，增加了非洲形势发展的变数，使矛盾冲突的解决增加了难度，最近一个时期非洲中部地区的冲突和政权更替以及几个国家发生的军事政变都说明了这一点。显然，非洲政治形势的根本好转还任重而道远。

其次，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以及发展中的困难重重，使非洲成为地球上最贫困的大陆。全世界最穷的国家绝大多数在非洲。内战和冲突使非洲成为“难民大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分别为 600 万和 2000 万，约占全世界难民总数一半以上。难民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常常引起国家间的纠纷，是非洲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非洲的生态环境也在恶化，这些都是非洲发展的严重障碍，非洲的发展还遭受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困扰，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和种种保护主义因素，使非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非洲的经济发展受国际因素制约很大，许多国家都依赖西方国家的财政援助，而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的官方援助却不断减少，私人资本的增加只使少数投资条件好

的国家受益，而多数国家却严重缺乏资金和技术，人才外流，智力资源缺乏也是一个不小的障碍，非洲真正实现经济独立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贫穷招致战乱，而战乱又加剧贫穷，贫穷和战乱又为外部势力插手提供可乘之机，显然，非洲的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将是艰难和曲折的。

总的来说，近几年来，非洲国家出现了一些积极的、重要的发展趋势，虽然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是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但它的发展是必然的，非洲正朝着一个前进的方向不断发展，成为国际新秩序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章 美国

美国的联盟战略

当今世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都知道以往的国际政治旧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控制和主宰国际事务的，他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诱压，政治迫使，让他们跟着列强的政策走，而我们现在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仍然面临着美国等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现实问题。

冷战期间，联盟战略一直是美国在盟国中保持领导地位、与苏联抗衡的重要手段，美国先后同拉丁美洲、欧洲、亚洲、中东等地区的 40 多个国家结成明确的军事同盟，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等多边军事集团。这一联盟体系被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为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继续推进全球战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更加重视了联盟战略，而且还根据国际安全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联盟战略面临的新的挑战，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调整。

当前，美国联盟战略调整的基本内容是：“扩大联盟的职能范围，充分发挥联盟的作用，强调与盟国建立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加强地区防务合作，重视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

冷战结束后，联盟关系已失去以往的存在基础，但美国强调继续维持原来的联盟体系，并竭力主张扩大联盟的职能范围。在欧洲地区，美国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力争将北约的责任区扩大到东欧国家。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等 27 个中东欧、波罗的海和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国，北约扩大了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职能也由原来保护盟国不受侵犯，扩大到对付北约以外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亚太地区美国继续维持他与日本、韩国等的条约，并且将美日的联盟关系作为他的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美日两国 1996 年 4 月签署的《日美两国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声称，日美安保体制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重新确立了新时期日美军事合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把美日军事合作的地理范围由以往的远东地区，也就是巴士海峡以北的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和前苏联滨海地区，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并且强调要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加强合作。

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美国是盟国中的“大哥”，处处以盟主自居，依靠自身强大实力，对联盟事务大包大揽，向盟国提供安全保障，牢牢地控制盟国。冷战后，美国完全改变过去的作风重视与盟国协商，协调与合作，充分发挥盟国的作用，强调与盟国建立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

冷战后，美国除维持正常的联盟关系外，还与一些友好国家签订了军事准入和合作协议。在海湾地区、东南亚都积极地与一些国家谈判、协商、达成一系列的协议，加强了美国对这些地区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还重视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在亚太地区表现的更加明显。冷战时期，美国曾在东南亚搞过反华的集体防务条约，瓦解后，只搞一些双边合作，不谈集体合作，现在美国改变态度，积极支持并且极力主张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企图通过这些活动，逐步建立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并在此范围内处理有关的安全事务。

美国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而联盟战略又是他全球战略的重要的支柱，美国为什么在冷战后对联盟政策进行这么广泛和重大的调整呢？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首先谋求世界霸权是美国联盟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谋求世界霸权一直是美国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美国利用强大的联盟体系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争霸。美国认为冷战为美国带来两大“胜利成果”，一是拖垮了苏联，美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二是建立并维持了联盟体系，当前，美国希望依靠联盟体系来扩大美国影响，建立并维护他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通过推进北约东扩，扩充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巩固冷战的胜利成果，同时削弱俄罗斯的力量，遏制俄重新崛起，避免俄对美再次形成威胁，美国通过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军事联盟，试图建立多边安全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全面介入亚洲安全事务，从而遏制亚洲的多极化发展，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阻碍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其次，全球性威胁的消失和新的地区性威胁的出现是美国调整联盟政策的外部原因。冷战后，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来自苏联的全球性的威胁，但以前两极格局掩盖下的许多矛盾日益显露，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面临着新的威胁，比如地区性不稳定，包括现实的地区性动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难民流动等跨国威胁等，为对付上述不稳定因素，维护其全球利益，仍然需要利用联盟，而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要想继续利用联盟就必须对联盟进行调整。

再次，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盟国自主意识的提高是联盟战略调整的内部原因。美国虽然在冷战结束后保住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但实力大大削弱了。美国意欲独霸世界，但“力不从心”，只得依靠联盟、利用联盟的力量去做自己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主要特征是扩大联盟的职能，加强盟国的作用，这一调整虽然是迫于形势的变化，但我们决不能认为美国减少了对盟国的控制。利用盟国、控制盟国、推行霸权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既定方针，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调整联盟战略，它控制与利用盟国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手段和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美国在牢牢地掌握对盟国的控制后，扩大盟国的职能，加强盟国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扩大美国的影响，利用盟国为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其获利者是美国自己，对欧洲盟国而言，他们虽然竭力扩大自主权，并且不断展开斗争，但却不具备抛开美国单独成立防务机构的条件，力量虽有所加强，但依然有限，在解决波黑冲突过程中，欧洲力量不足的问题已经显示出来，美国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欧洲的安全仍离不开美国，因此美国并不特别担心西欧力量的加强，对于日本来说，虽然急于扩展他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但行动却受到相当大的制约，短时间内，日本不会脱离美国，甚至更加倚重美国，需要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和美国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支持。

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盟，本来是冷战的产物，在冷战结束后已经失去存在的前提，但是美国为维护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推行霸权主义的目的，适时地对联盟战略进行调整，妄图继续利用盟国来实现其称霸全球的目的，这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要障碍，但是世界形势日益变化，多极化格局日益形成，美国与盟国的利益冲突日趋强烈，美国妄图利用联盟战略来达到他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称霸世界的目标未必会取得美国所期待的

效果。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

美国的亚太战略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即亚洲太平洋地区）为实现国家利益所进行的谋划，它集中反映的是美国的亚太利益。多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没有变，那就是建立自由贸易体系，确立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冷战后，由于国内和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推行亚太战略的手段有所调整，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第一，美国以联盟战略为基础，重新确定与盟国的条约关系。所谓联盟战略是指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结成一定形势的战略盟友关系，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的战略。二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是国际社会的重点，美苏各为一方，建立起了自己的同盟集团。为配合其全球战略，美国将亚太地区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地区，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遏制对象，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韩国、日本签定了联盟条约、建立了各种同盟。安全因素是联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动机。当初，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联盟条约的动机是认为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苏对抗与争夺霸权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的这些同盟集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斗争矛头也转为以对抗苏联为主。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及其盟国主要敌人的苏联已经解体，其继承者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亚太地区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现在不称霸，而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而美国以安全为理由，在亚太建立起来的这些联盟集团不但没有解散，反而进一步发展。冷战后，美国一再强调美国与亚太盟国关系的重要性，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关系。美国认为冷战结束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进入一个多变、不稳定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亚太各种力量的独立自主意识在增强，日本已在寻求与美建立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东盟国家开始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发挥整体作用，国家间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此外亚太地区还潜伏着一些容易引发冲突的因素。所有这些在美国政府看来构成了对亚太安全的威胁，将损害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因此保持联盟条约，美国就可以保存在亚太的军事存在，防止出现“力量真空”，发生危机时，还可以直接进行干预。美国想要建立以美为主导的亚太新秩序，加上一向认为自己才是领导者的心态，是不会放弃在亚太地区进行扩张的。

第二，美国亚太战略突出预防性外交。冷战期间，美国在亚太地区与苏联争夺霸权时，强调实力政策，并以对抗为主要形式。冷战后，美国在推行亚太战略时，明显突出了预防性外交的重要性。原因是，美国政府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被掩盖的一些矛盾和危险开始显现，这些矛盾包括民族主义倾向增长、领土争端、核扩散、一些大国未来走向不明朗，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在美国看来“难以把握”，因此，需要通过预防性外交来避免危机的发生，预防性外交在当前美国对外战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为了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做好四项工作，第一项就是开展预防性外交，通过各种外交消除危机，缓和紧张局势，将美国影

响扩大到非传统盟友国家中去，树立美国领导地位形象。美国已经将预防战略定为新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指出在保持适当威慑力量的同时，把预防性防务作为安全政策的第一步，通过预防性外交，为维护和平创造条件，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真正的目的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预防性外交。1993年3月，朝鲜半岛因核研制问题出现危机，美国一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接受核检查，一方面加紧与朝鲜谈判。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协商，以加快解决朝鲜半岛危机。1994年10月，经过多次磋商，美朝正式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美国的对华战略中，预防性外交被置于重要地位，美国新的亚太战略强调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都保持与中国的接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鼓励双方军事机构进行交流，美国政府认为，接触为美国提供了一条影响中国的途径。接触使美国有可能影响中国，使中国在那些对美国有着重大安全利益的不稳定国家和地区，如朝鲜半岛，起着一种稳定形势的作用。

第三，美国强调利益的整体性，开展全面外交。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不是一种单一领域的战略，而是将“安全需要”、“经济需要”和“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三者相结合的“一体化战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曾经大肆鼓吹要大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提倡“民主”和“人权”。上台后，克林顿将推进“民主”和“人权”视为对外战略的一大支柱，置亚洲各国文化、历史背景于不顾，实行强权政治，动辄对别国施压或者以经济制裁相威胁，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克林顿在对华政策中加大人权攻势，将人权与贸易挂钩，导致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严重影响了中美双边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拥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前景广阔，美国意识到如果一味在对华政策中追求“人权”目标，美国政治、经济都将受到重大损失，在一些战略问题上也会失去中国的合作，这很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整体利益。因此，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把人权问题与审议延长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克林顿说，延长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将能使美国得以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接触，并强调，必须从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的更广阔范围看待与中国的关系，需要把中美关系置于更大，更可能产生效果的框架之内。1997年5月19日，克林顿在宣布把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时称：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非常符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认为，世界上任何地区的问题都与美国有关；美国应该保持全面参与，因此，在发展同盟国关系的同时，美国还注意发展同非盟国的关系，甚至是“冷战时期的敌手”的关系。在东北亚，美国改善同朝鲜的关系。冷战时期美国视朝鲜为敌对国家，并发动了侵朝战争，两国关系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冷战后，美国认为朝鲜半岛存在着不稳定因素，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性。朝鲜核危机出现后，美国在与朝鲜谈判解决危机的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改善同朝鲜的关系。苏联解体后，美国还抓紧时机向蒙古渗透，提供大量经济援助，阻止其他力量“填补真空”。在东南亚，美国加快改善同越南的关系。1994年2月，克林顿宣布解除对越南实施了长达19年之久的贸易禁运，为美越关系的改善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95年1月，美越经过谈判，决定在对方首都开始互设联络处，表明美国对越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7月

11日，美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之后，美国的企业界开始向越南大力渗透，力求在东南亚取得新的立足点。在南亚，美国为谋求现实和长远的利益，注意发展同印度的关系。

美国强调各领域利益的统一，及广泛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目的在于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参与，使美国亚太战略得到总体推进。而美国亚太战略的推进也将使美国进一步树立大国形象，谋求领导者地位。美国妄图继续保持其霸主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未来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占据中心地位。

美拉关系新趋势

1997年5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墨西哥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随后，出席了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和在巴巴多斯举行的加勒比首脑会议。访问期间，克林顿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就贸易、贩毒、移民和环保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分别与墨西哥签署了《反毒品联盟声明》，与中美洲七国签署了关于加强在贩毒、移民、经贸和环保等领域合作的《圣何塞说明》，这是克林顿1993年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拉美，受到了拉美和外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克林顿还计划在1997年秋季访问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明年将出席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届美洲首脑会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克林顿三次访问拉美，这预示美拉关系将有新的变化。

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内，欧洲和亚太地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聚焦点，拉美地区是一个“有时受到忽视的灰姑娘”。除了第一夫人希拉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国防部长佩里出访过该地区外，克林顿从未正式访问过拉美地区。克林顿除于1993年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2月倡议举行美洲首脑会议并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外，在美拉关系方面没有更多的作为。而克林顿连任总统后不久，即决定出访拉美，他的意图不外乎以下三点：

第一，想要以此为契机，修复美拉关系，平抑拉美国家的不满情绪。一个时期以来，美国与拉美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纠葛不断。在人权问题上，以美国的人权观为准对拉美国家横加指责、粗暴干涉。贸易上，美国一方面要求拉美国家进一步开放他们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对拉美国家的产品关闭大门，由此引发了美国与拉美一些国家的贸易之战。此外，美国颁布的带有强烈治外法权特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更是引起了拉美国家异口同声的谴责。拉美开展多元化外交，降低对美国的依存度，对美的离心倾向有所加强。鉴于此种情况，克林顿为了阻止美拉关系的进一步下滑，利用他竞选连任成功后拉美国家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及时宣布要分期分批访问部分有代表性的拉美国家，修复、改善美拉关系，以示亲善。

第二，想要以这次出访为起点，与拉美国家建立起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帮助解决美国国内社会经济难题。国内问题是克林顿政府的施政重点，其中贸易、反毒、移民等问题与拉美国家关系较大。

第三，想要以这次访问为动力，重新启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家安全战略重点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移，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凸显，发达国家之间争夺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日趋激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

先后于 1993 年 9 月，1994 年 8 月提出了名为“扩展战略”、“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的全球战略，主张以“全球民主化”为核心，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以贸易作为“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的工具”，对国际和地区事务进行广泛“参与”，遏制或封锁具有反美情绪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和巩固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实现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与此相对应，美国的西半球地区战略也作了重大调整，减少了在拉美事务中的单边主义作法，强调利用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多边组织在促进本地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中的作用。在这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克林顿宣称要“谋求建立联盟”，尤其是“建立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联盟”，他把在“全世界关键地区建立立足点”的联盟体系战略作为他的全球战略布局的主干。克林顿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集团化远景，正是为了主宰西半球并以此为依托，强化全球竞争地位。然而由于墨西哥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及受到美国大选的牵制，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没有进展，这挫伤了拉美国家的积极性，拉美国家纷纷从多元外交上找出路，与此同时，德国、日本和西班牙等国也乘虚而入，力图挤进美国“后院”，参与和分享拉美新兴市场。法国甚至提出建立欧拉自由贸易区，对美国在拉美的支配地位形成挑战。美国要恢复和加强在他传统势力范围内的主导权，就需履行在 1994 年美洲首脑会议上的承诺，采取实际步骤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推进美洲自由贸易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集团化战略布局，以从“领导地区”走向“领导世界”。

从克林顿的拉美之行看，他第二任期对拉美的政策走向将更加灵活、务实，美拉关系将有所恢复和发展，其特点是：

第一，同第一任期相比，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对拉美的重视程度将有所提高。其动力来自于克林顿的内在驱动力，拉美地区的自身活力和欧盟及亚太等国的竞争压力。拉美国家从以往的历史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寻求自己的新定位、通过开展多元化外交，积极发展同欧盟、亚太国家的合作，时时“提醒”、“敦促”美国不要忘记拉美。克林顿也认识到“在拉美与其他国家结成新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落在后面”的危险性。在欧洲国家重返拉美、亚洲国家开拓拉美的形势下，克林顿政府也将着力巩固与拉美的经济关系。因此美拉关系会有所升温。

第二，同美国与欧洲、亚洲的关系相比，美拉关系在克林顿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仍处于次要地位。如果说，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美拉关系的特点是“疏而不离”，那么，“温而不热”将是今后几年美拉关系的基本态势。外交政策是实力地位的体现，美国凭借他独一无二的综合国力，实行的是有选择的重点外交。突出欧洲、稳住亚太、渗入非洲、巩固拉美是克林顿第二任期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克林顿于 1997 年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美国对外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由和平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没有分裂的欧洲，同时扩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强有力的北约组织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以实力和坚定的态度迎接亚洲的挑战，加强从波斯尼亚到中东乃至非洲的和平民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南扩，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虽属必要，但对美国来说却不象北约东扩那样迫切。

第三，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尚不可替代。单从投资角度看，1990—1995 年，美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超过欧洲，占这一时期进入该地区投资的一半。因此，尽管欧盟和亚太一些国家在

拉美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美国在该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日趋减弱，但目前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地位还无人匹敌，传统的美拉关系不会有转折性的变化，尽管拉美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立足地区、面向美国、重视欧洲、开拓亚洲的多元外交政策，对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有所增强，但决不会以牺牲传统的美拉关系为代价。拉美国家对希拉克来访时提出的扩大双边关系的种种建议只给以谨慎的反应，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克林顿的首次拉美之行会给美拉关系带来新的变化，但决不是质的变化。克林顿在实施其拉美政策的过程中，也会荆棘载途，遇到多方面的困扰，国会反对派的反对，美国公众的“内向”发展要求，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拉美国家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摩擦、反毒、移民等一系列问题上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地区外大国的染指等因素，都会引起美拉关系的波动。但总的来说，由于占有天时地利等有利因素，克林顿政府“领导拉美”比“领导世界”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美国不会丧失按照他的战略意图左右拉美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然而对于拉美国家来说，在解决拉美国家的头号敌人——贫困和不平等时，起主要作用的还是那句西方老话：自助者天助！

第五章 国际问题

新亚欧美关系

亚洲、欧洲、美国是未来世界多极格局中重要的三极，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三者的关系发展将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十分重视与欧洲的关系，将与亚洲的关系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但随着亚洲的崛起，美国的相对衰落及亚欧关系的新发展，亚欧美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中比较重要的国际关系，这三极关系的互动及发展日益对国际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亚欧美新三极关系揭开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但缘于历史、社会制度、经济差距等方面的矛盾，亚欧美新三极关系的发展面临空前的挑战。

第一，欧美争夺难解难分，争夺欧洲事务主导权是欧美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是欧美关系中的症结之一。自前南斯拉夫危机以来，美国就力图避免直接卷入这一令人头疼的“烦恼”之中，希望欧洲国家独立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又不愿改变长期对欧洲国家发号施令的习惯任凭欧洲国家在独立处理欧洲事务中“忘乎所以”，把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给冷落了。于是美国采取“遥控”的办法乘欧洲国家对波黑内战一时无可奈何之机，加强对波黑内战的干预。美国先后提出解除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加强对塞族空中打击的主张，试图通过强制手段迫使塞族屈服。美国的这一做法引起西欧国家的强烈不满，欧美在波黑问题上争吵不休，最终是美国抓住波黑三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契机，经过多方努力后于1995年底达成了代顿和平协议。历时5年之久的波黑内战以美国在欧洲事务主导权争夺战中取得第一回合的胜利而暂告一段落。然而，日益强大的欧洲国家又怎么肯善罢干休，轻易把欧洲事务主导权拱手让给远隔千山万水的美国来操纵？欧洲国家在波黑问题上与美国交手中失利之后，竟想把同美国争夺欧洲事务主导权的重点放到了加强欧洲安全机制和西欧独立防务的问题上。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是美国对欧政策的基轴，随着冷战的结束只有转变和扩大职能才能继续生存下去，美国力图通过转变和扩大北约职能保持其在欧洲事务中的干预能力和领导地位。而西欧对此却反应不一。以法国为首的强硬派反对扩大北约的政治作用和地域范围，主张加强欧安会和西欧联盟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以此来削弱、排挤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欧安会的安全机制问题，欧美之间又展开了又一轮的较量。美国企图以北约为依托，用以执行欧安会的一切决议和行动，欧安会则保持它的论坛性质，以此来抬高北约的地位，并企图把北约融入欧安会，使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控制得到进一步加强。欧安会多数成员则主张完善欧安会的机制，把欧安会建成一个在防止、控制和解决冲突与危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军事机制。美国一度对波黑内战的消极态度促使欧盟意识到加强自身防务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欧盟确定西欧联盟在欧盟范围内发挥防务作用，建立独立的西欧防务实体，发展西欧联盟的军事实力和实战能力，以削弱北约对欧洲安全的传统控制权。美国虽然表面承认西欧独立防务的重要性，却又反对任何排斥美国并独立于北约的西欧防务实体。欧美之间对欧洲事务主导权之争正吵得热闹。虽然有协调和让步，但实质矛盾却未能解决。

第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抬头，欧盟内部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亚洲地区军备竞赛升级成为亚欧美新三极关系发展的隐患。美国共和党控制国会后，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抬头，对欧洲的关注“有减无增”，在波黑内战、对欧盟贸易争端等问题上要求政府做局外人，坐山观虎斗。欧盟内部对美国肆意妄为、干涉欧洲事务大为恼火，欧洲人主导欧洲事务的主张深得人心，欧美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疑虑逐渐增强。80年代中期以来，减缩军费开支和减少武器交易成为世界潮流。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许多国家纷纷裁减军备，把对外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竞争、发展综合国力上来。只有亚洲却是另一番景象，许多国家纷纷增加军费、扩充军备。在核力量上，亚洲地区除美、俄、中三国外，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都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亚洲地区的扩军是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东盟独立自强呼声高涨、热点地区时而升温 and 西方少数别有用心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分不开的。事态的发展无疑会给亚欧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尽管亚欧美新三极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但在世界经济集团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亚欧美三方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国内的长治久安，都有意协调彼此的矛盾和分歧，加强政治经济的合作。未来亚欧美三极关系有望朝以下方向发展。

第一，欧美之间对共同利益的追逐将会促使双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需相互协调，但矛盾是持久的，调和是暂时的。维护美国以往取得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反对任何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言行是美国的总体战略目标。而欧盟未来的战略目标却是争取与美国平分天下的资格，共同主导世界。在现实条件下，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无力单独采取外交行动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上对欧洲仍有所求，只有寻求欧洲的支持才能保证他对国际事务的领导地位，欧洲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对欧洲而言，正在崛起的欧洲随着独立自强意识的发展和作为世界一极的责任促使其加快独立自强的步伐，但困于欧盟刚刚起步，独立防务力量的羽毛尚未丰满、还不具备独立应付欧洲动荡的能力，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局势的稳定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欧洲目前仍需依靠美国的参与和帮助来维护自身的稳定。因此，欧美之间对北约东扩的争吵将可能会暂时协调和妥协下来，共同对付欧洲安全中的不确定因素。总之，欧美双方在竞争中合作，谋求在政治、经济、安全及相同价值观等方面的共同利益是未来一个时期欧美关系的主流。

第二，亚洲的力量不断壮大，地位不断上升，与欧美在各个领域展开全面的竞争。亚洲地区目前还不具备与欧美平起平坐的资格，但随着亚洲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中心东移”、“太平洋世纪”等预言正在变为现实。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的经济高速发展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普遍不景气的大气候下可谓一枝独秀。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地位将不断上升，亚洲也将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第三，未来亚欧美关系的发展将受到大国关系调整与变化的制约和影响。大国间的关系的发展与调整对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新亚欧美关系中包括了世界所有的大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美日安全机制的加强与美日贸易摩擦。欧美相互依靠又相互争夺的尴尬、俄罗斯一改亲西方政策加强同中国的联系、美中之间龃龉不断等，都使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当前大国关

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和平、小争吵、多摩擦。在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之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对内对外的的工作重心，以追求整体综合国力的发展为首要目标，以经济安全推动综合安全进程。美日之间的贸易纠纷不断，但最终都是“化干戈为玉帛”，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多年来日本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却又难以完全摆脱美国控制，仍需在迈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寻求美国的支持，美国一超地位的相对衰落难于应付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困难和压力，迫切需要日本帮衬。美欧关系的发展与美日关系的发展有相似之处，俄罗斯一改亲西方、一边倒的政策，积极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总之，未来亚欧美关系的发展必将以大国关系的发展为轴心。亚欧美三方必将有一番激烈的争夺，围绕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展开一系列的角逐。这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主旋律。

当代世界政治发展

我们所说的世界政治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在政治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平、强权、民主、合作、对抗等政治政策。它常常表现为一个国家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利服务。我们大家都知道，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抗，形成两极政治格局，这里的“极”是指用来描述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和能够充当世界政治格局主角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但进入90年代，苏联解体，一极垮台，两极的政治格局也随之终结，然而新的政治格局却尚未形成，这次政治格局的转换并不是因为新的多极格局已经发育完全才发生的，而是由于苏联一极的垮台导致的，因此这就决定了新旧政治格局交替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演变的过程。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政治力量又重新分化组合，由于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新的政治格局还没有形成，但是世界政治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正在加速，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趋势。

大家都听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反作用于经济。让我们先看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自70年代起，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的衰落，日本的迅速崛起和西欧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形成了三大中心，80年代后，美苏经济实力进一步衰落，日本、德国经济增长迅速、使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更加明显，日德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向美国挑战紧逼，为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美日欧都在以自己为中心积极筹备建设地区性的经济集团，而这种地区集团化的发展必将促进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而经济的多极化又必将引起政治的多极化。

两极政治格局终结，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基本特征——军事对抗也将被以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所取代，而未来的多极化格局也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的较量上，苏联解体后，美国自以为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了，妄想建立美国领导的国际新秩序，然而事实上，美国的综合国力方面的实力地位已大大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的比重大大下降，国内问题成堆，经济问题尤为突出。同时，美国在欧洲、亚洲的主导地位已受到德国、日本的挑战，德国、日本正积极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

任理事国。这一切都构成了美国梦想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妄图建立以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重大障碍。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各国都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危机，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大大下降了，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俄罗斯是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潜力，同时它仍是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军事大国，因此它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不能忽视，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的未来发展和走向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也会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它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容小看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出现停滞状态，但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发展却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增长势头，同时它们之间还加强团结与合作，如东盟正在加快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计划建立东亚经济集团。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进步与发展受到世界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化中，中国不仅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还保持了发展的高势头，发展速度令全世界吃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上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以上所述的因素和作用将失去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但我们还要看到虽然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在缓和下的动荡形势也在增长，由于旧的格局解体，原来被美苏争霸和两大集团对峙时掩盖的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同时国际竞争开始展开，一些地区的新矛盾和冲突正在增加。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未使欧洲更加稳定相反矛盾纷纷暴露出来，使原来比较稳定的欧洲变得动荡不安，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宗教冲突而导致了各种动乱、冲突，甚至发生了战争，这又造成了大批难民问题，这些难民纷纷涌入西欧，给这些国家带来了许多问题，导致了西欧政局的不稳，西欧民族主义和极右势力日益抬头，新法西斯势力开始活跃，又进一步造成了社会动荡不安。

两极格局瓦解后，还有一些地区，主要是中东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并未解决，反而有了新的发展和激化趋势，伊拉克遭到失败后的孤立及与美国现在的对抗、阿拉伯国家集体决策、以色列立场的强硬、以及非阿拉伯国家对中东地区影响也不断加强，从而使中东地区的矛盾更加复杂化。

苏联解体后，力量向西方倾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无理干涉他国内政的倾向更加抬头。打着维护“人权”、“自由”、“民主”的旗号，要把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强行推广到全世界，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施加政治压力，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矛盾，引起动乱，造成其社会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安。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两大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也宣告结束了。在全球裁军的总趋势下，一些国家阳奉阴违，将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一些地区矛盾冲突加剧，双方纷纷购买武器武装自己，西方大国乘机倾销军火，大发其财。这种现象最严重的是中东，其次南亚、东盟等军费开支也在增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解体后核武器和核技术的扩散。总之，军备竞赛的升级、军费开支的增加，无疑会成为引发地区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秩序，还面临着一个重

要的问题，那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抬头。过去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两个超级大国，一个解体了，另一个实力也大大减弱了，但霸权主义并未消失，其他西方国家也都为成为政治大国、妄图控制和主宰国际事务做努力，新形势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世界各国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障碍。

最后我们要看到随着旧的世界政治格局的终结，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国际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当今世界和平的外表下还有许多不稳定因素以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进一步抬头，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仍需进一步努力，但我们坚信结果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新秩序经过各国的努力必将建成。

